

# 毛泽东的鲁迅论

李松

(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摘要:** 研究毛泽东与鲁迅思想的关系可以推进 20 世纪中国文艺思想历史景观之纵深层面。毛泽东的鲁迅论表明了二人思想的相通, 反映出毛泽东的思想具有深刻的“五四”新文化内涵, 也反映出毛泽东政治理念的工具理性。毛泽东对鲁迅评价的演变轨迹体现了革命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的形成裹挟着个人意志与历史逻辑的悖论, 该矛盾的解决可以释放出“五四”文化与毛泽东思想遗产的当代能量。

**关键词:** 契合; 歧异; 毛泽东; 鲁迅; 革命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I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9)-0557-06

毛泽东与鲁迅作为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轴心人物, 都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家、思想家, 他们的心有不少相通处。不同之处在于, 前者作为卓越的政治领袖, 多从政治理想出发规范文学的价值与功能; 后者作为杰出的思想先锋, 是从启蒙思想出发倡导文艺的独立性和功利性。这些相通与不同, 从毛泽东的鲁迅论(以下简称“鲁论”)都能看出来。笔者试图通过对“鲁论”的分析来打开 20 世纪中国思想的历史纵深层面: 第一, 鲁迅在生前死后被中共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被动形塑的经典化; 第二, 毛泽东对鲁迅的理解反映了毛泽东“六经注我”的解释方法; 第三, 不同阶段、不同立场的“鲁论”反映了毛泽东从青年、中年到晚年的思想演变轨迹; 第四, “鲁论”作为反思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窗口和镜像, 反映了革命现代性的内涵与演变。通过分析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对鲁迅的不同评价, 可以发现二人思想明显的契合之处。但是同时, 我们也发现“鲁论”并不是铁板一块、固定不变的, 从歧异之中可以发现毛泽东与鲁迅思想某些耐人寻味的缝隙, 其差异反映了毛泽东革命现代性思想的裂变。无论是契合还是歧异, “鲁论”都直接或间接地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 一、从“鲁论”看毛泽东与鲁迅思想的相通

毛泽东比鲁迅小 12 岁, 鲁迅比毛泽东早逝 40 年,

从目前的历史记载来看, 二人生前并没有过直接的交往。但有大量事实证明, 鲁迅的作品与思想在毛泽东的政治理念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记, 已有的不少研究成果对此作了细致的梳理。<sup>[1-3]</sup>

1940 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总结 20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生力军所取得的成就, 他对鲁迅作出了极其崇高的评价, 认为“鲁迅的方向, 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sup>[4](698)</sup>。为什么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继承和违背都以鲁迅作为他的精神资源呢? 其原因是, 如果要论“五四”新文学的历史功绩的话, 任何人都无法绕过鲁迅, 因为鲁迅以深刻的启蒙思想和杰出的白话文创作实绩为“五四”文学和文化树立起了历史的丰碑, 并成为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民魂的象征。除此之外, 笔者认为毛泽东与鲁迅思想上的某些相通之处也是重要的原因。古人云, “惟其有之, 是以似之”<sup>①</sup>。同样, 作为思想者的毛泽东与鲁迅“同明相见, 同听相闻, 惟圣知圣, 惟贤知贤”。<sup>[5](93)</sup>1966 年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 曾经坦承他与鲁迅思想的相通性: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 他从洛阳走到成皋, 叹道: 世无英雄, 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作为独立特行的思想者, 他们都有着无法言说的孤独感, 也许正是由于时空的阻隔, 毛泽东对鲁迅的个性、思想有着精神上的共鸣。“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 解剖自己, 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 我亦往往如此。”<sup>[6](186)</sup>鲁迅的个性气质、反

思精神颇为毛泽东所欣赏。毛泽东将鲁迅引为不曾会面却神交甚契的知己了。在建国后提倡“双百方针”的自由气氛中,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谈话时曾回答“如果鲁迅在世”的可能情况:“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sup>[7](2457)</sup>毛泽东不仅仅深谙鲁迅作品的思想,而且他深刻地理解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桀骜不驯的气质与威武不屈的人格。“如果今天鲁迅还活着,他会怎样?”毛泽东回答道,“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sup>[8](190)</sup>可见,毛泽东还深深地理解鲁迅是一位有血性、有追求的思想者——宁可为真理殉道,不愿低头向强权妥协。具体来说,二人思想的契合还表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痛感国运的艰难和民族的危局,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进步人士都具有基本一致的思想追求,即反对专制、迷信和权威,揭露国民性的愚昧和落后,坚信文化革命是社会进步的根本之道。毛泽东与鲁迅思想的共同点之一是:反对封建专制。从毛泽东的思想演变轨迹来看,他经历过一个相当混乱而复杂的阵痛期。他回顾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说,“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sup>[9](125)</sup>与当时很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他向启蒙思想的靠近得益于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毛泽东审视过自己思想的成长进程:“《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sup>[9](125)</sup>在毛泽东早期的文稿中,他猛烈地抨击封建专制:“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了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就不能不反对的。”“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sup>[10](115)</sup>毛泽东呼吁妇女解放,反对包办婚姻。他主编的四期《湘江评论》充满了反帝反封建的反叛精神。在40多篇文章中,《民众的大联合》提出“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

狱,求见青天”<sup>[10](71)</sup>。该文言辞激烈,理论尖锐,在全国影响最大。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思想越来越激进。但这时候他的思想还是混乱的,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那时候他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常常和朋友讨论无政府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前景。1920年冬天,毛泽东在第一次组织工人的政治实践中,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第二次到北京期间,他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找到了一些中译的共产主义书籍。他回忆道,“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sup>[8](131)</sup>毛泽东以反帝反封建作为思想的起点,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成为了他一生思想最重要的转折。

二人思想的共同点之二是塑造新人。从梁启超、胡适到鲁迅等启蒙思想家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革命的理想,那就是塑造新人来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落后局面。鲁迅弃医从文以后终生信守“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信仰,即以文艺改造国民性。他的这一想法影响了许多青年。同鲁迅一样,毛泽东对于国民的愚昧、麻木也深有体会,他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中写道:“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sup>[10](1)</sup>毛泽东曾经感慨道:“现在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sup>[10](693)</sup>在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将儒家的道德革命与法家的法、术、势以及阶级斗争理论有机结合起来,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策略。

那么,二者思想契合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最艰难的时候,鲁迅给予了声援和鼓舞。对中共倡导的抗日统一战线,鲁迅表示了赞同。这些固然是毛泽东对鲁迅具有好感的直接原因。从深层心理分析来看,笔者认为,毛泽东将鲁迅推崇为圣人的做法,恰恰反映了他终其一生根深蒂固的圣人情结。

毛泽东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作题为《论鲁迅》的讲演。他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

是现代中国的圣人。”鲁迅之所以是圣人，是由于“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也就是掌握了“大本大源”：鲁迅的政治远见符合“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的标准。他的斗争精神、牺牲精神也是与圣人“抵抗极大之恶而成”一致的。<sup>[11]</sup>1971年毛泽东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sup>[12](289)</sup>毛泽东为什么将鲁迅比做中国圣人第一呢？这固然反映了毛泽东对鲁迅思想的极度推崇，其实，也从侧面反映了毛泽东自己的崇圣思想以及圣人理想——立志成为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圣人。他在早年的文稿《伦理学原理》中写到：“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己以外尚有圣贤。”<sup>[10](224)</sup>当毛泽东读高小时，他曾抄录过一首古人的《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游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sup>[13](326)</sup>何等的霸气与雄心！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仁道追求相似的是，毛泽东毕生都在追求内圣外王之道。1917年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毛泽东就思考过这个问题。他在《体育之研究》中指出，圣人是最大的思想家，在《致黎锦熙信》中又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圣人就是得到“大本”的人，而贤人则低一个层次，是“略得大本的人”。所谓“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因为圣人握有真理，所以能“动天下之心”，产生“动天下”的效果。毛泽东认为，“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而救弊之道在于从大本大源的圣人哲学入手。如果普及了圣人哲学，那么对民众就可以“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sup>[10](238)</sup>“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给毛泽东“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的称号。后来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这四个太多了，愿意只保留“伟大的导师”一个称号。毛泽东坚信，只有掌握了大本大源宇宙真理的人才可以把握世界的变革，而如同圣人的“导师”堪承此任。

## 二、“鲁论”折射出的毛泽东“六经注我”式解释方法和毛鲁思想的歧异

毛泽东与鲁迅思想之间有契合之处，但并不是简

单雷同的。毛泽东对鲁迅的看法更多是依据政治上的需要，摘取片言，古为今用，赋以新解。首先，是政治化的解释。毛泽东是从中国现代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的角度来评价鲁迅的，着重强调的是鲁迅的“政治远见”，——“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的见解是那样的稳定，那样的清楚。”<sup>[11]</sup>其次是他的“斗争精神”，——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他“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献给了革命斗争”，“一贯不屈不挠地同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充满了艰苦奋斗的精神”。毛泽东还指出，鲁迅虽然“并不是共产党组织的党员，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了了的”，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sup>[11]</sup>鲁迅这一切品质都是毛泽东反帝反封建、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所需要的。毛泽东把鲁迅思想全盘政治化，而没有给出其他阐释的可能性空间。事实证明，当他的判断成为经典化的定论以后，建国后30年学界对鲁迅的研究要突破这个框架就相当艰难了。

第二，是道德化的解释。毛泽东从道德评判的角度高度评价鲁迅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和残害。他一点也不避锋芒，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迹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sup>[11]</sup>伦理道德是中国文化倚重的核心精神，在特殊的战争环境里，鲁迅的这种道德化的形象可以凝聚民族精神、可以将刚勇无私的献身精神典范化。毛泽东结合他对革命的看法，引用鲁迅的话论证自己的观点。例如，毛泽东认为“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他引用鲁迅的话“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作为论据。<sup>[14](45-46)</sup>谈到反对“党八股”时，毛泽东说“装腔作势，藉以吓人”之类的“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sup>[4](830)</sup>

第三，是实用化的解释。1958年12月，毛泽东为《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写批注时，从鲁迅的一句“于时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饕蚊遥叹，予在广州”出发借题发挥。鲁迅说的“饕蚊遥叹”实际上是说的一段个人的情感纠葛。而毛泽东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写道：“从那时到今天，三十一年了，大陆上的饕蚊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

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试仿陆放翁曰: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乃翁。”<sup>[7](2453)</sup>建国以后随着极左思想的发展,文学艺术在毛泽东的眼中一步步成为了政治的附庸与工具,是不是毛泽东并不理解文学的本质属性呢?当然不是。毛泽东曾经一针见血的评论说,“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是民族化的。但是,他谈到鲁迅后期“杂文有力量”时,他认为原因“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认为“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文革”后期,针对“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的情况,毛泽东进行文艺政策调整时,又搬出了鲁迅作为调整的依据。他对江青说:“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sup>[15]</sup>鲁迅可以成为激进革命的急先锋,也可以成为平衡政策的砝码,鲁迅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二人文艺思想歧异的原因,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鲜明地看出来。该文献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成为了日后各种文艺方针的“元叙事”。毛泽东认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sup>[4](865-866)</sup>“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sup>[4](869)</sup>而这一文献背后的思想支撑其实源于毛泽东青年时代坚信的阶级斗争革命模式,文学艺术只是服从这一斗争策略的工具。1941年毛泽东曾对斯诺介绍过他的思想发展过程:“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sup>[7](322)</sup>当阶级斗争成为唯一的政治理性、成为历史的必然逻辑,具有模糊阶级界限可能性的人性、自由、博爱就成为了值得警惕的意识形态观念。

总之,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始终是一种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论断。他首先把鲁迅思想、精神与人

格经典化,然后利用鲁迅来论证自己思想的“政治正确”,从而实现自身判断的经典化。因此,“文革”后的研究者们批评鲁迅被肢解、被庸俗化的倾向,力求“把鲁迅还给鲁迅”。

### 三、反思:毛泽东的革命现代性思想

当我们套用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这一西方现代性文化视角去分析中国个案时,在毛泽东这一第三世界国家代表性的思想者面前,这一模式的分析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目前中国学界通常以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关于现代性的分类来作为理解中国现代性历史的理论视角,笔者认为,简单套用的模式反而遮蔽了本土历史与文化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毕竟中西思想发展线索与社会革命道路都具有巨大的差异。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革故鼎新的革命时代的话,毛泽东为世界思想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思路——革命现代性。

在中国,“革命”一词的古义是指顺应天命民心改朝换代,如《易·革》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在西方,“Revolution”本义是指工程学中循环运动的一个单位;在政治上指方向的突变。在中西不同的历史时期,“革命”一词歧义丛生,例如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巴黎革命、美国独立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等等。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的诠释者的论述,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将“革命”理解为暴力性的阶级斗争。他认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sup>[4](17)</sup>而革命的推行方式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一种历史常态。“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sup>[4](1487)</sup>在西方文化里,现代性(modernity)指关于“现代”的性质和经验。而人们一般认为西方的“现代”历史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涉及到资本主义、世俗文化、民主、人权、启蒙等等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理念。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现代性是指17世纪笛卡尔以后哲学观念的后续发展。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对西方外来力量冲击后的反应。中国现代性既是西方现代性时间上的延续,也是异域空间自身现代性的演变,还是中西现代性观念融合与分裂的历史。从现代性角度梳理毛泽东与时代社

会变动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革命”是毛泽东现代性思想最关键的定语，“革命”也是编织毛泽东思想碎片的线索。在毛泽东眼中，革命现代性不仅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颠覆，还包括对帝国主义剥削与压迫的对抗。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基础上，他力图通过革命的手段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旧中国，尽快消灭社会的各种差别和不平等现象，从而建设公正、平等、民主的现代性社会，以至不断逼近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革命现代性并不简单排斥审美，但它所要求的审美必须是“新古典主义”的艺术形式，因而它的美学是一种政治美学。

毛泽东一生的中国革命与建设成了一份我们无法绕开的历史遗产，在公平、正义、民主成为人们自觉追求的普世价值的时候，人们带着复杂的心态不禁对火红的革命岁月投以温情一瞥。那么，毛泽东的革命遗产在何种意义上具有重思的价值呢？笔者认为，我们需要对毛泽东的革命现代性观念进行冷静的反思，这种反思并非简单否定，而是在反思中获得启示。第一，毛泽东的“不断革命”思路体现了启蒙现代性的线性历史观与革命理性的政治工具论。“文革”时期，他以同一性思维在国际国内推行无限扩大的阶级革命。结果，以实现自由、民主、平等为初衷的革命在革掉制度性的官僚压迫之后，革命者本身的历史地位遭到消解、权利遭到剥夺。革命者陷入“革命的辩证法”的怪圈，被作为“反革命”接受清算，如周扬、林默涵、田汉等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沦为阶下囚，甚至含冤自杀。然而，林彪作为党的接班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殒身异国之后，在毛泽东看来却只是“形左实右”。第二，毛泽东的革命理想带有极其强烈的浪漫主义想象，他希望成为全球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与精神导师，以不断激进的社会革命与思想教化实现大同梦想。而当缺乏严格约束的政治权力结合乌托邦激情势不可挡、狂飙突进时，毛泽东置身的现代民主政治框架被逐渐拆解、胀破，独断专行、权力斗争得到孳生的土壤。“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推动民主和自由的冲动的确在渐渐消失。对个人来说什么是自由？答案之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二个概念是个人能最大程度地实现自我。已经成熟起来的毛泽东对自由的这两个概念都不相信——尽管他喜欢前者甚于后者。他清楚地‘知道’什么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他所想要的。那绝不是每个公民都去实现自我，而是按照毛泽东设想成为建设斯巴达式的亚洲的一块砖瓦。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将带有孔子、托尔斯泰色彩的改良冲动和现代国家的功能混为一谈了。”<sup>[16]</sup>毛泽东是天

才式的诗人、有创造力的哲学家，也是实用主义型的政治家。三者结合起来，他是成功的政治诗人、诗人哲学家、政治哲学家。但是，当他以诗人政治家身份领导社会建设时遭遇了挫折。第三，毛泽东以道德伦理作为思想动力进行社会动员，而忽视了现代性的问题并非仅仅是精神革命所能解决的，制度建设也是现代性政治文明的题中之义。毛泽东受王船山、颜习斋、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等湖湘学派的影响，极其重视理想和道德力量，讲究“立志”“修身”的理学精神。他认为哲学是一切事物的“大本大源”，“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人生目的在“实现自我”，极力主张“身心并完”，“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从而十分强调个人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即“个人精神主义”，追求“独立所有”的道德完美境界。长期艰苦的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依靠政治觉悟、思想教育引发高昂的革命热情、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这种动员广大群众的政治力量、精神力量被认为是无坚不摧、无敌不克的。而当“林彪事件”如惊雷炸裂，人们在震惊之余，也开始转向怀疑和失望，于是道德理想国无情地粉碎了。

#### 四、结语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是在个人思想发展过程中动态形成的，他与鲁迅在思想上的歧异矛盾重重，甚至水火不容，实际上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的鲜明个性。从启蒙思想的个性解放、非理性的无政府主义到信奉马克思主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中的内在线索是：建立独立自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建设平等、民主的社会，塑造纯洁、无私的无产阶级人性，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所许诺的乌托邦社会。毛泽东对鲁迅思想与艺术的不同判断，反映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在矛盾。毛泽东非常清醒地明白文学的特性，他曾经在给陈毅的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从他《讲堂录》<sup>[10](356)</sup>的记载来看，他很清楚文学的美感特质。他对“文革”后期“样板戏”一统天下而造成的百花凋零也深为不满。但他更加理智地明白，为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文艺必须成为一条没有硝烟的革命战线。毛泽东身上纠集着个人与历史的深刻矛盾，例如传统与现代、人格道德与世俗社会、政治革命与文化变革等等。这些矛盾有时是对立的，有时是统一的，有时既有对立又有统一。以这些矛盾作为分析的切入点，我们也许可以获得理解当前中国问题的钥匙。

## 注释:

① 参见《诗·小雅·裳裳者华》

## 参考文献:

- [1] 蓝棣之. 症候式分析: 毛泽东的鲁迅论[J]. 清华大学学报, 2001, (2): 72-78.
- [2] 陈晋. 和“圣人”对话——毛泽东晚年文化心态的一个侧面[J]. 北京党史, 1997, (3): 26-28.
- [3] 甄梁. 毛泽东对鲁迅的推崇[J]. 党的文献, 2007, (2): 18-20.
- [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5] 王符. 潜夫论笺校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6] 叶永烈. 江青传[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3.

- [7]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8] 毛泽东.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3.
- [9] [美]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M]. 董乐山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
- [10] 毛泽东. 毛泽东早期文稿[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0.
- [11] 毛泽东. 论鲁迅[J]. 七月, 1938, (3): 10-13.
- [12] 陈晋.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 [13] 陈晋. 毛泽东与文艺传统[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
- [14] 毛泽东. 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 [15] 毛泽东. 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N]. 人民日报, 1976: 11-5, (1).
- [16] [美]罗斯·特里尔. 毛泽东的自由观: 他的早年与晚年[J]. 湖南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版, 2007, (6): 101-107.

## An analysis of Mao Zedong's viewpoint on Lu Xun

LI S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Mao Zedong and Lu Xun's thought can further the historical horizon and depth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Mao's agreement on Lu Xun's thought reflects a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the new culture, which began after the May 4th Movement (1919), Mao's appraisals on Lu Xun, which reflect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n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evolvement of Mao's opinions on Lu Xun embodies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 of revolutionary modernity, whose engendering process involves the paradox between individual volition and historical logic and whose resolution will release the power of May 4th culture and Mao Zedong thought in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agreement; disagreement; Mao Zedong; Lu Xun; revolutionary modernity

[编辑: 苏慧]